



叶凯著

物的意识形态

—— 消费文化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 LIN WEN SHI CHU BAN SHE

物的意识形态

——消费文化研究

叶 凯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物的意识形态 : 消费文化研究 / 叶凯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72-3683-3

I. ①物… II. ①叶… III. ①消费文化—研究 IV.
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4880 号

书 名：物的意识形态：消费文化研究

著 者：叶凯

责任编辑：钟杉 陈昊

选题策划：丁瑞 李丽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廊坊市鸿煊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8.25

字 数：230 千字

定 价：32.00 元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 话：0431—86037451（发行部）

网 址：www.jlws.com.cn

目 录

引言：一把椅子的意识形态	1
第一章 一辆车开启一个时代	8
第二章 偏执狂丈夫与消费文化批判	19
第三章 平等的商品 平等的文化	25
第四章 从充气娃娃看欲望的平等	35
第五章 消费主义的神话	47
第六章 我买故我在	61
第七章 作为购物中心的城市	72
第八章 物对城市的切割	83
第九章 中产阶级的都市想象	94
第十章 品牌的魔力	113
第十一章 时尚的权力	140
第十二章 控制、吸纳与拒绝	158
第十三章 御宅文化的消费形态	222
第十四章 萌经济与萌意识形态	237

引言：一把椅子的意识形态

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是物的意识形态，我就拎起一把椅子。

谈到物的意识形态，虽然力求通俗易懂，但有的时候卖弄学问的狐狸尾巴还是会露出来，当然也不会露多少，本来就没多少可露。齐泽克不断地用大众文化来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当然不是要使理论浅显易懂，而是要摆脱习惯上对理论的“正视”，从而对理论母题“斜目而视”，他说：“在尽力对某些理论母题‘斜目而视’时，关键并不在竭尽全力地‘图解’高级理论，使它‘浅显易懂’，进而也省去我们进行有效思考的力气。关键在于，如此图解，如此对待理论母题，要呈现出某些倘非如此就无法呈现出来的东西。”^①他还说：“本雅明曾经推荐过一种在理论上颇具能产性和颠覆性的做法：把某种文化内的最高精神产品与普通的、平凡的、世俗的精神产品并置一处，同时解读”。^②

于是，我们今天就谈这把椅子。朋友是做设计的，我问

^① 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正文第3页。

^② 同上书，序言第1页。

他：“假如让你设计一把椅子，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朋友回答：“美观、舒适。”这自然是常规的设计思路，那么，“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的话，你会保留什么呢？”“舒适，”他回答。那么，中国古代家具中，最有代表性、知名度最高的椅子应该是太师椅，这种椅子坐上去一点也不舒服，为什么中国人在一千来年的时间中，非要坐这么一把不舒服的椅子呢？

这种椅子大家应该都见过、坐过，在经典的造型中，椅面、扶手、靠背几乎都是成直角，当然是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坐上去自然浑身不舒服，你必须正襟危坐，才能与椅子融为一体，而任何的斜着、靠着，都会同椅子格格不入，你要为这个椅子而生成合适的坐姿，这才是设计的主要目的，它就是不希望你坐得舒服，就是要让你时刻保持肌肉的紧张，保持一种正式的坐姿。人必须以绝对物化的方式来完成自我，这就是太师椅要传达给大家的信息。

于是，在人与椅子的关系中，椅子变成了主体，人只是客体，人要为椅子而设计出坐姿。这把椅子就象征着权力，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什么样椅子上，都要意味着权力的认可，所以大家会用一生去抢这把椅子，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都要排座次，因此不能随便设计制作。

这种椅子往往用最好的木材来制作，在设计上，往往要配上各种雕饰，甚至会用各种宝石、金银来镶嵌。坚固、稳重，象征着地位的不动摇，稳固压倒一切，哪个太监打扫卫生时，敢随意搬动一下皇帝的椅子，那脑袋就要掉了。在传统的人与物的角逐中，物战胜了人。

这样坚固的椅子可以遗留给后人，于是就有了时间的延

续。看似时间在延伸，但其实时间是静止的，因为这把椅子使时间静止在了某个节点。椅子就是父权的象征，以过去的辉煌的象征。你坐在父亲的椅子上，你就变成了贾政，于是贾宝玉只能出家。

这把椅子看似生活在历史之中，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却是静止的，它只活在某一个节点之中，摆脱的这个节点，椅子的价值就消失了。当家庭败落，家具流落到新的人间的时候，它的符号象征意义已经发生完全的转变。而只要家族兴旺，断没有卖家具的习惯，即使旧了，也会堆在某个地方安度晚年。因此，虽然消费的是其象征符号，但同消费社会中的商品有很大不同，它几乎不具有商品性，同当下的奢侈品消费的符号消费不同，同现在市场中红木仿古家具的销售也不同，在传统中，他的价值不是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而是权力的授予与遗传。

但现在很多人买这种红木家具，则有着我们通常所谓的“弑父”心态，权力与地位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得，威严可畏的传统象征可以随意地坐在屁股底下。消费者感受到了颠覆的快感，他们要用一把椅子来完善自我实现。虽然有了诸多的设计上的改良，但坐在这样的椅子上依然不会太舒服。于是，你可以通过购买来消解太师椅原初的意识形态，并赋予新的意义，但是，当你用屁股来戏弄权力的时候，你已经重新被物化了，只要这把椅子依然是作为椅子而存在，那么获胜的就还是“物”。

在现代设计中，椅子往往是最能检验设计师的设计能力的产品之一，设计师几乎都钟爱设计椅子，都希望设计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椅子的设计看似简单，所需的材料也能随

手而得，可以独立完成，可以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困难也在那里，看似构造简单的椅子，却有包含着诸多难以平衡的地方，材料、力学、美学、人性化、个性化、市场化、空间等，这些都要结合在一起考虑。这同样是一场人与物的角逐，而再这场角逐之中，人的因素开始被放大。



这是一把现在看来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椅子，英国设计师 Robin Day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设计了这把椅子，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椅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看到它或它的后裔。此后我们最为日常化的椅子设计，几乎都源自这把椅子。而且从这类椅子的设计理念中，我们能够很好的感受到现代与传统的差异，感受到物的消费社会中，人的放大。消费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把椅子的设计理念与现代精神的契合。

首先，这是一把平等与民主的椅子。聚丙烯这种材料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被开发出来之后，迅速在工业产品中广为运用。它价格便宜，可以大幅度降低产品成本。坚固耐用，容易清洗，便于堆放，轻便灵活。而且生产时间很短，可以

快速大批量生产，一次成型，减少了前后期的加工，安装方便。

同福特的T型车一样，它诉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做出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买得起的椅子。成本降低，使之成为各阶层消费者都能随手可得，而且它适合各种场所，再隆重盛大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家族系列产品的影子，它把传统的椅子所具有的各种权力象征全部削掉，只留下为人的屁股服务的这种功用。人使用的是功能化的椅子，而不再关注于作为符号的椅子。

其次，这是一把空间的椅子。这种椅子便于堆放，可以很多把椅子放在一起，节约了空间，这是传统的椅子所无法做到的。空间为人服务，物的空间变小，人的活动空间加大，这就是椅子的人性化设计。

再次，这是一把有着不同的时间观念的椅子。这是一把活在当代的椅子。传统的椅子生活在历史、当代、未来之中，通过继承、遗传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是一把一次性的椅子，很难相信你想把它传给你的儿子孙子。

我们常常对这种“活在当下”的时间观提出批判，认为没有历史没有未来，人只为现在而活着，成为欲望的奴隶。而其实，这正是当代人的自信，不再需要历史来背书，不再需要把未来当作萝卜挂在驴子前面。这种对当下的信心，正是对未来的信心。

这种时间观念看似是静止的，反而是流动的，只有对现实有了自信，才可以从容地面对过去与未来。时间不再是一个节点，也不再具有重负，而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椅子用完就扔，没有抛弃历史的负罪感。这就是一种新的时

间观念。

二战之后，人们把这种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通过商品的设计与生产表现出来，对科技的信心、对自我的信心、对活在当下的信心，通过一把椅子表现了出来。

此外，这把椅子在设计上，去掉了一切罗马式的、巴洛克式的、洛可可式的、维多利亚式的等一切传统时代中必不可少的那种装饰物，把椅子还原为了一把椅子。它要展示的不再是装饰之美，而是产品之美，肉体之美，裸露的权利。人的肉体的禁锢与解放同精神的禁锢与解放往往同步进行，20世纪逐渐开始了肉体的美的展示，人们不断要求裸露的权利，产品的设计思路也是如此，简介到把无用的附加物全部抛弃，给人一种彻底的裸露的产品，也是设计的发展思路，从 Sony 的收录机到 Walkman，再到苹果的 iPhone，都是这一路线，这同意识形态的“祛蔽”的过程完全一样。

这种装饰，借用巴迪欧的话来讲就是“伪饰”，有学者对巴迪欧的话这样解释：“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伪饰，‘忠诚’是伪饰，‘价值’是伪饰，‘阶级立场’和‘革命热忱’也是伪饰。这些伪饰的确玷污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在这些伪饰之中不但是扭曲的，甚至被各种各样的伪饰所撕碎，我们必须穿越在我们各种伪饰的身份之中，如同《黑客帝国》中那个被视为真实的身份。我们有可能洞悉其中的真相，但即便洞悉，我们也只能与之同流合污，这正好印证了齐泽克所谓他们明知道如此，仍然如此去做的犬儒主义困境。”^①

^① 蓝江：巴迪欧《世纪》中译者前言，见巴迪欧《世纪》中译前言第 17 页。

比如说，正是基于这种对伪饰的厌恶，政治家变成了政客，人们把他们当作演员来看待，演得好就喝彩，演不好就扔鸡蛋，他们不再是革命者、不再是英雄。人们宁可崇拜苍井空，也不再相信有英雄存在。人们宁可选一个喜欢的演员上台当总统，也不再喜欢职业政客。

这就是四四方方的 iPod、iPhone 和 iPad 出现之后，人们为什么为之迷狂，它去掉了一切的装饰性，把机器之美、产品之美尽情地展示了出来。这也就是裸露的美，一种无法拒绝的美。

这还是一把可以独立存在的椅子。传统的椅子，必须与桌子配合才能存在，也只有在这种匹配中，一种审美才可以出现。但这把椅子完全可以抛弃桌子而独立，即使在一堆椅子中，这把椅子依然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而不再是一个客体、一个部件。

这也是一把允许不断被复制的椅子，在这种复制中，原作的“此时此地”的意义消失，复制变成了创造，复制消解了被强行赋予产品之上、赋予人之上的意义，物走向了平等，并促进了人的平等。

此外，这也是一把向男权主义开战的女权主义的椅子，一把可以随意拼装拆解的椅子，一把蕴含了 20 世纪无限的美学观念的椅子，这也就是安迪·沃霍尔为什么喜欢在其作品中展示产品、商品，尤其是大众消费品，因为整个 20 世纪就是一个产品的世纪、物的世纪，人类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物来展示。

第一章 一辆车开启一个时代

从任何角度来看，现在消费社会的来临，都要追溯到福特 T 型汽车的出现。绝不要仅仅看作是一种新的车型，或者是出现了一种划时代的消费品，而应该认识到，随着 T 型车的问世，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劳资关系、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这一切，似乎都可以从这一辆车谈起。

工业革命带来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低效率的手工作坊被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所取代。福特的 T 型车是最早采用流水线生产的产品。用传统的装配方式，一个月只能生产 11 辆车，但采用流水线生产之后的 1914 年，当大部分标准化零部件生产出来之后，组装一辆汽车只需要 93 分钟，也就是这一年，福特的第 1000 万辆车间世，以至于全世界的汽车中，90% 都是福特生产的，而其中有一半的车是 T 型车。

这不只是一辆汽车，这辆车改变了世界。伟大的产品绝不仅仅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件新的工具，它在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存理念，改变我们的文化。这样的产品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出现，像是 100 年前出现的可口可乐，像是最近出现的 iPhone。

对于福特来讲，当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的时候，产量不断提升不再是问题，如何把车卖出去才是主要问题，于是，他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想办法让人来买，让尽可能多的人来买。

这样，就必须使汽车这种以前小部分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变成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的大众消费品，这也是福特生产这部车的一个重要理念：要生产一辆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的车。

传统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不需要太多的消费；而工业革命的初期，生产力低下，产量不高，能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变得最为关键，但是，当产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消费便成为了企业存活与否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把这大量的价格昂贵的汽车让社会消化掉呢？常规思维当然是降价，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办法。

流水线与标准化使降低成本成为可能，于是福特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汽车的价格。最初，一辆 T 型车最初的价格是 850 美元，福特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规模，使价格降到了 300 美元，大体相当于现在的 3300 美元。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价格，即使对于工薪阶层来讲也已经可以承受。但是，仅仅价格下降，并不能直接带来销量的增长，因为还要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消费者因素。

对于消费者来讲，能购买这样的产品，还必须具有两个因素：有钱、有闲。

首先是有钱，如果消费者收入微薄，挣的工资仅仅能够养家糊口的话，也不会掏钱买这样的高消费产品。因此，必

须提升消费者的收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涨工资。福特说：“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能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①

1914 年以前，福特工人每天的工资是 2-2.5 美元，而 1914 年之后，每天的最低工资——不是平均工资——是 5 美元，后来又涨到了 6 美元，而大约 60% 以上的员工工资高于 6 美元。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那时一个福特工人的工资不吃不喝买一辆车，就需要一年的时间。比较一下我们现在呢，我们国内目前的城市平均个人月工资，大约为 3000 人民币左右，如果买一辆桑塔纳的话，不吃不喝大约需要 2 年左右的时间，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

所以福特坚持付给工人高工资，绝不是单纯的善良，而是能带来双赢的市场结果，消费者收入少，收损害的是企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很多企业家由于在清教文化的影响下，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回报社会，但是，如果没有利润的话，善良是无法支撑起企业的。福特说，对于高报酬，“工人的雄心应该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当然，似乎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有人相信，如果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的话，那只会对雇主有利——而根本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好处。有这样的感觉存在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它确实存在，并且也许它的存在是有自己的合理性的。……但如果他们看到艰苦劳动的果实就在他们的工资袋里——证明更努力地工作意味着更高的报酬——那么他们就开始认识到他们是公司的一部

^① 亨利·福特：《我的生活和工作》，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1 页。

分，公司的成功依靠他们，他们的成功依靠公司。”^①

这一转变，首先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出现，工人不再是资本家疯狂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成为与资本家合作获取利益的关系。其次，一种新型的消费原则出现，大量的产品可以顺利地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品，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得以完成。但是，且慢，仅仅有钱还是远远不够，消费者有钱了，还必须有时间花钱，这就是有闲。

多少年前，我们嘲笑日本人的劳动强度，过劳死就是日本人的发明，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劳动强度远远高于日本，过劳死已经见怪不怪，每每读到青壮年加班猝死的新闻之后，我们往往不胜唏嘘，但是唏嘘之后，继续加班。媒体上每年的高强度、高压职业排名不断翻新，越来越多的职业变成了高危职业，这种超高的劳动强度，已经远远把日本人抛在了后面。虽然目前中国的消费能力让全世界震惊，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社会财富绝不应该只是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必须让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上升为中产阶层，社会才能基本保持稳定。

所以，完善的市场良性循环必须让消费者不仅仅有钱，还必须有闲。

所谓有闲，就意味着消费者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消费，就像世界各国的假期不断增多，不仅是用法律来强制保护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同时也有促进消费的重要原因。这在当下的中国，更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手段。

^① 同上书：第 91-92 页。

目前全球通常是 8 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 40 小时。历史书上会告诉我们，这一工作时间是经过不断的工人运动甚至大量的流血事件而争得的，但我们的历史书却不会告诉我们，有没有用其他方式来缩短工时的可能性。

的确，在早期的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劳动强度非常之高，常常每天要工作 12 小时甚至更多，工人不断地通过罢工游行示威等方式要求缩短工时，尤其是在 19 世纪，欧美等国都不断涌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甚至多次出现暴力抗争与流血冲突。虽然后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通过了 8 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但在执行方面，很多企业却依然漠视这一法律，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依然不断。不过，我们又会发现，20 世纪之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劳资冲突在各个国家总是会不时出现，甚至在 1937 年，福特汽车也遇到了由加入工会所引起的流血冲突，但是，以缩短工时、减少劳动强度为目标的罢工或示威冲突却很少爆发，工人的罢工往往也以经济诉求为主。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企业不再使用延长劳动时间为获利手段了呢？当然，法律的约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从福特开始，资本家越来越认识到了，让工人有闲暇时间的重要性。披星戴月的工作当然可以提高产量，但是，相对于产量的提升，产品能否卖得出去变得更加重要，工人收入增加，但是如果沒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消费，也不利于市场的持久发展，于是，企业主便不再是被动地缩短工时，这样，关于缩短工时的劳资冲突就几乎在这些国家消失。

当然，不仅是福特，其他很多大企业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开始遵循这样的原则，于是，通过生产与消费的和谐配

合，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形成。渐渐地，一个富裕稳定的中产阶级大量出现，成为社会的主体，形成了真正稳定和谐的社会。

综合起来可以这样看，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大量的商品充斥市场，于是，生产的问题转而变成了销售的问题，只有把大量产品卖出去，企业才可以存活；而想要把商品卖出去，那么就必须让消费者有钱与有闲，于是，加薪、缩短工时，便成最直接的手段，如是这般，现代消费社会开始形成。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只是普遍的原则，具体运作起来绝非这样简单，但当一种市场原则确立之后，辅之以法律的维系，双方通过不断地磨合与博弈，共赢局面才可以形成。

我们必须提醒大家不要有幻想，永远也不要奢望统治者或企业家良心发现，为劳动者加薪缩短工时，任何国家都不会如此。而通过暴力或直接对抗，又只能两败俱伤，好的社会依赖于制度的确立，消费社会确立了双赢的市场原则。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好的制度使鬼变成了人，坏的制度使人变成了鬼。有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澳大利亚最初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很多船运公司承接了这项运送犯人的工作，政府按照运送犯人的数量来给船主付钱。为了挣更多的钱，船主便尽可能多的把犯人塞进船舱之中，而且为了省钱，给犯人的食物很少，船上的医疗条件也差，因此途中犯人的死亡率非常高，英国政府虽然采取各种手段，依然难以遏制这种情况的出现。终于，英国政府想出了办法，把根据运输的犯人的数量来付钱，改成了根据登岸之后犯人的数量来付钱，这一政策一出现，立刻减少了犯人的死亡率，这一